

多主体协同视域下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谢衍晴¹, 姜艺¹, 王玉玲^{*}

(1.新疆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830000)

摘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 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对国际化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成为高校学生对接社会需求的核心素养。然而, 当前高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普遍面临育人主体单一、场域封闭、多方联动不足等问题, 难以有效支撑复合型国际人才的培养目标。本文基于多主体协同理念, 系统剖析高校在跨文化交际培养层面育人的碎片化困境, 厘清高校、社会平台及政策支持等多元主体在育人中的责任联动机制, 进而构建“校内协同—校社协同—政府引领”三位一体的培养路径。研究旨在完善高校跨文化交际能力育人体系, 为新时代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 多主体协同; 高校学生;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基金项目: 2025年自治区级(省级)大学生创新项目《“讲好中国新疆故事”背景下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
项目编号: S202510755172

DOI: doi.org/10.70693/202609034517

引言

当前,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各国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密切交往。在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战略背景下, 高校学生作为国家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主力军, 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不仅关乎个人发展的广度与高度, 更直接影响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近年来, 我国各大高校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 如改革外语课程、增设跨文化类课程、建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然而, 从实际成效看, 现有培养方式仍存在学生真实体验不足、思辨能力较弱等问题。其原因在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在具体实践中往往被简化为某一学科或某一方单独的任务, 不同责任主体之间缺乏目标共识和资源整合, 形成了“闭门造车”的局面。

从已有研究看, 针对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讨论, 多围绕外语教学、新闻传播、商务沟通等领域展开, 侧重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材设计等。这类研究为培养实践提供了重要基础, 但较少从各责任主体及其协同关系出发, 探讨如何培养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事实上,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无法仅靠单一主体独立完成, 而需要多方协同推进, 包括高校内部各部门之间的配合、高校与社会的合作, 以及政府、高校、社会三方的协同努力。

基于此, 本文引入多主体协同视角, 在梳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概念与意义之后, 分析当前培养现状与不足, 并从校内协同、高校—社会协同以及政府引导下的政府—高校—社会三方协同三个层面提出建议, 以期完善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体系提供参考。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

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首先应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概念界定, 厘清什么是跨文化交际能力, 其核心要素有哪些。许多学者都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术语进行过界定, 但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始终未曾有过统一。Deardorff (2006) 通过一项对教育机构和跨文化交际学专家的调查研究, 发现最受认可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定义是: “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基于跨文化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有效、恰当的沟通能力”。

而围绕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与量表的一系列研究与开发, 则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核心要素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简介: 谢衍晴 (2001—), 女,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

姜艺 (2000—), 女,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

王玉玲 (1972—), 女,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通讯作者: 王玉玲

其中,陈国明与Starosta(1996,2000,2007)持续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构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三角模型,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分解为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并设计了相关量表(ISS)。张卫东、杨莉(2012)则以陈国明的研究为基础,从文化知识、文化意识和交际实践三个维度构建了符合中国学生需求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系。跨文化知识是开展跨文化交际的基础,包含本土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两大体系。本土文化知识是树立文化自信的根基,目标语文化知识则是了解目标语国家和地区的关键渠道。系统化的文化知识有助于规避认知盲区与文化误解,为跨文化交际开展提供理论支撑。跨文化意识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思想准备,是一种心理素质和情感素质的结合体。在这个维度上,要认识到文化无优劣好坏之分,只有形式与内容之别,在情感上要认同这些差异;要以开放的心态理解和对待异文化,辩证看待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差异,在文化对比中完成自我反思,为交际行为提供正向认知指引(张卫东&杨莉,2012)。跨文化交际实践是知识与意识的外在落地形式,是检验交际能力的核心标准。包含语言运用能力和非语言运用能力两方面,要求个体在真实跨文化场景中,灵活运用外语完成精准沟通,依托交际策略化解文化冲突,实现高效、得体的双向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他是化解跨文化沟通壁垒、落实外语育人目标、培育国际化人才的重要能力支撑。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化与对外开放格局的不断扩大,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然成为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在国际商务领域,跨文化交际能力影响着经贸往来的顺畅程度和国际商务环境的营造。在跨国经贸活动中,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是建立信任关系、达成合作共识的基础,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制定符合当地文化特点的营销策略。

在外宣与文化传播层面,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讲好中国故事、推进中外文化互鉴的核心载体。国际舆论环境存在文化差异与认知壁垒,只有具备专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够立足异域文化视角,采用适配国际受众认知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表达方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发展成果,促进中外文化双向交流。

而归根结底,各行业、各领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落地与提升离不开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大学生是国际交流合作的核心主力军,其跨文化素养与交际能力直接决定我国对外交流的整体质量。大学阶段作为价值观塑造、能力养成、知识储备的关键时期,系统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于产业发展和国际叙事传播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具有基础性、核心性与先导性的战略地位。外语教学是系统化培育学生跨文化认知、思辨意识与交际实践能力的核心阵地,强化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是新时代外语教学贴合社会需求、对接国家战略、实现立德树人育人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实际上,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仅靠高校外语教学远远不够,它不仅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支持,更有待政府部门的前瞻规划和牵头引领。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由上文可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要素包含多个方面,这决定了其培养必然是多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知识层面的认知主要依托课程教学;意识层面的涵养更多依赖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与日常交往的长期浸润;交际实践层面的提升则离不开真实跨文化场景中的实践锻炼。与此相对应,培养责任的承担者也必然是多元的。在高校内部,教学部门、学生工作部门等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关联;在高校之外,企业、各类社会组织和机构在提供实践平台、开展活动等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通过政策引导、项目资助等,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提供支持和保障。

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本质上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各主体协同发力、同向而行。如果把培养责任窄化为某一门课程、某一个专业的任务或者各责任主体“各自为政”,就难以有效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目标,培养效果也会不尽人意。

而当前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大多以专业或领域为中心进行探讨,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类。

其一,以外语教学为中心。外语学科和公共外语课程长期被视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主阵地,各高校普遍依托外语类专业、外语课程等,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纳入人才培养目标并予以落实,因此现有研究也大多围绕高校外语教学这一领域展开。例如,苏婧(2022)指出,部分教师在教学期间,虽然强化了对教育理念和模式的更新,也能有意识地在课堂中融合跨文化的内容。然而,针对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的内涵,教师却不能深层次地分析和探索,从而使得学生在理解跨文化之后,却不具备应用的能力。王颖(2021)则建议教师要善于整合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采用任务式教学、案例式教学、讨论式教学、行动导向式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知识的自主建构,使其熟练掌握异域文化、他者文化思维模式、信息编码和解码的方式,构建丰富的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

其二,以非外语类学科的跨文化课程为中心。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跨文化交际不再只是外语专业学生的任

务, 化工、医学、旅游管理、汉语国际教育等专业也多根据需要增添跨文化课程。如袁春波认为化工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一是需要协调其培养的内容, 如协调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和专业文化能力培养; 二是需要协调其培养方式, 如大学英语和专业英语分工协调(袁春波, 2025)。彭春菊(2021)认为培养医科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可从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提升师资力量、增设文化课程以及创设情境, 学习医学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方面开展。

这种以专业或领域为中心的培养模式, 其优势在于能够结合学科特点, 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培养方案。但其局限同样明显, 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 培养实践呈现“碎片化”与“孤岛化”。各专业、各课程之间缺乏统筹与衔接, 跨文化内容被人为分割为相互独立的模块, 学生难以将语言能力转化为解决专业领域国际性问题的实际能力。其二,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大多数培养实践偏重课堂理论讲授, 课程内容与行业岗位实际要求对接不紧, 教与用之间出现脱节, 难以培育深层次的跨文化理解与适应能力。此外, 高校的教学体系缺乏完整的教学流程与评估, 校园相关文化主题活动也不具备持续性, 导致学生缺乏真正的文化学习语境以及真实的实践机会(马慧, 2020)。其三, 主体间协同机制不畅。高校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协作尚不完善, 优质资源流通受阻, 学生难以获得国际舞台的实践机会; 高校内部教学、学生工作、国际交流等职能部门之间也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究其根源, 在于培养实践与研究长期缺乏“责任主体”这一组织脉络。培养被分割于不同专业、部门与领域之间, 各主体责任边界及协同机制难以系统厘清, 整体效能由此受限。这也解释了为何当前相关探讨多以专业或领域为中心, 而少以责任主体为脉络。

上述分析表明, 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面临的核心问题, 并不在于缺少某类课程或活动, 而在于缺乏以责任主体为脉络的协同机制。各主体虽然在不同环节都发挥了作用, 但存在目标不统一、信息不共享、过程不衔接等问题, 难以形成持续合力。因此, 从“各自为政”走向“多主体协同”, 是提升培养效果的关键。所谓多主体协同, 不是由某一学科或部门“闭门造车”, 也不是将各主体的努力简单叠加, 而是在政府引导下, 明确高校、社会等责任主体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的职责分工, 打通校内与校外、教学与学生工作、课堂与实践之间的壁垒, 形成责任共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育人格局。具体而言, 这一路径可沿校内协同、学校—社会协同以及政府引导下的政府—学校—社会三方协同三个层面展开, 下文将分别予以探讨。

三、多主体协同作用下的培养模式探讨

多主体协同是指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所涉及的责任主体之间, 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 形成育人合力, 共同致力于培养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素养、输送复合型国际化人才。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责任主体主要包括: 负责人才培养的高等学校, 涵盖校内师资、课程体系及各类课外教育资源; 接纳并最终用人的社会平台, 如企业与社会组织机构; 更有作为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核心的政府部门。促进多主体协同培养既要明确各方优势, 又要找到核心契合点, 通过关键节点搭建共育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联络网。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应首先构建校内协同, 打破课内课外育人边界。教研部门进行课程设置调整, 联动外语教师和专业课教师, 不仅要在外语课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知识、意识和交际实践能力, 更要在专业课中融入跨文化交际因素。除了要在第一课堂内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育之外, 高校应建设教师、辅导员、学校社团组织协同育人团队, 通过主题教育、社团活动联动, 实现第一课堂理论赋能与第二课堂实践赋能深度融合, 补齐单一课堂育人短板。

育人阵地和最终用人平台需保持紧密联系, 构建高校-社会双主体协同, 搭建校外实践育人系统。无论是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文旅机构推动文旅出海还是科研教育推动全球协作, 都需要大量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若只依靠内部系统的短期培训, 人员将缺乏系统性文化认知框架, 因此需要与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双主体协同。要共建协同育人平台, 企业和社会机构将高校学生引入真实涉外工作场景、进行线上跨境云交流; 牵头搭建国际青年对话项目, 让学生在真实跨文化情境中锻炼冲突处理、文化共情、双向传播能力, 实现校内理论与校外实践协同衔接。

强化政府部门引导的政府-高校-社会三方育人协同。不管是高校的校内协同机制, 还是高校-社会双主体协同, 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可或缺, 在前二者协同之外, 要强化政府部门引导的-政府-高校-社会三方育人协同格局。政府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育人体系中, 应该起到政策引领、资源统筹、规范监管作用。政策引领上, 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水平纳入教育评价体系, 明确各主体权责与协作路径; 资源倾斜上, 设立专项基金,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优先资助高校与社会的合作实践课程与相关项目; 监管上, 对育人成效显著者给予政策激励, 对流于形式者督促整改。三者相辅相成, 推动政府-高校-社会三方主体的协同规范化。

四、 结论

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深入的背景下, 高校学生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储备的重要组成, 其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响应国家战略需求的核心素养。本文立足于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分析当前高校在国际化跨文化人才培养的研究现状, 剖析了当前研究领域的现存缺口, 并构建了多元主体协同的实践路径。

研究发现, 当前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多以专业和领域为中心, 针对外语教学、新闻传播、商务贸易等专门领域, 以及大、中、小各学段学生外语课堂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研究相对丰富, 但以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各责任主体作为研究脉络, 特别是探讨各主体之间协同育人的研究不够具体, 形成了“闭门造车”的局面。本文提出的构建校内协同、高校-社会双主体协同, 以及政府-高校-社会三方协同的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 通过各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与资源整合, 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从零散的单主体责任探讨, 过渡到多主体协同共育的方向, 完善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机制, 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 [1] DEARDORFF D 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s a student outcom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6, (10) : 241 – 266.
- [2] Chen, G. M. & J. STAROSTA.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 [3] Chen, G. M. & J. STAROSTA.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 Synthesis[J].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96, 19: 353-383.
- [4] Chen, G. M. & J. STAROSTA.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nsitivity scale[J]. Human Communication, 2000, 3: 3-14.
- [5] 张卫东, 杨莉. 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系的构建——基于外语教育视角和实证研究方法[J]. 外语界, 2012, (02): 8-16.
- [6] 苏婧.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J]. 科技资讯, 2022, 20(8): 168-171.
- [7] 王颖. 大学生外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理论模型与实践运用[J].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21, 37(8): 89-91.
- [8] 袁春波. 化工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J]. 塑料工业, 2025, 53(1): 164.
- [9] 彭春菊. 医科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和研究[J]. 国际公关, 2021, (3): 87-88.
- [10] 马慧. 大学英语教育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J]. 现代英语, 2020, (21): 96-98.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Sector Collaboration

Xie Yanqing¹, Jiang Yi¹, Wang Yuling*

¹.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China's deepening opening-up strategy, demands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ly-oriented talents are grow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has thus become a core competency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align with social needs. Howeve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t universities today is typically hindered by the over-reliance on a single educational stakeholder, insular training settings, and inadequate collaboration among multiple parties, falling short of effectively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ound international talents. Grounded in the concept of multi-sector collabor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fragmentation dilemma in university-bas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t then clarifies the coordinated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s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cluding universities, social platforms, and policy support systems. On this basis, it constructs a three-in-one cultivation pathway that comprises intra-campus coordination, university-society collaboration, and government-led guidance. This study aims to improve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system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t also seeks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talent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multi-sector collaboration; college students; cultiv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